略论中国近现代译家及其译学思想

刘一纯, 伍攀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学教授方文华撰著的《20世纪中国翻译史》一书从时间顺序纵向叙述了20世纪我国清末民初时期、民国时期和建国后的翻译活动,从翻译理论及其代表译者的经典译作横向的阐述了我国五四前后的翻译概况。该书旨在以知识性和趣味性为特点帮助广大外语学子了解并把握我国20世纪翻译的历史。该书是唯一的一部叙述我国20世纪翻译历程的史书,为广大翻译理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关键词:20世纪;翻译理论;代表译家

中图分类号:G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4)04-0133-03

方文华教授将清末民初时期的梁启超、严复及林纾称为当时的“译坛三杰”,他们无论在译作类型或翻译观念上都大有建树,对我国的翻译事业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五四”时期,鲁迅、郭沫若和茅盾不但在文学上熠熠生辉,在翻译界也成就非凡。该书为再现译者的风格,在不同章节中提供其译作片段但不妄加评论由读者裁定优劣,并且大量录用翻译名家的译学言论,为广大翻译理论研究者提供立论的依据,同时反映了我国近100年来翻译工作者的努力和中国翻译事业的飞速演进。

1 清末民初时期的翻译活动

鸦片战争之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等爱国志士渴望接收新的文化、思想观念,他们不满于现状,挑战旧的传统观念与文化。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都在发生了巨大变化,翻译界也顺应潮流大量翻译了西方的文化知识,强有力的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个新纪元。梁启超、严复和林纾并称为译界“三杰”,改造了当时中国人落后的思想观念,留下了许多不朽的翻译作品。这一时期大量外国诗歌、小说和戏剧涌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发展。同时,由于广大译者的不懈努力,中国文化也在西方广泛传播。

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著名学者和翻译理论家,他集政治家、文学家、翻译家于一身,对当时我国的翻译做出了杰出贡献^[1]。梁启超在上海南京路创建大同译书局,宗旨为“本书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来变法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

课,以便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梁启超把当时小说的文学价值以及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翻译了外国小说《世界末日记》《十五小豪杰》《俄皇宫之人鬼》《佳人奇遇》。梁启超在翻译这几部小说时用得都是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具有很强的文学感染力,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梁启超对翻译做大的贡献就是从一定高度上引导翻译的潮流。他要求译者首先必须慎重选择所译之书,其次要遵循翻译的规则,特别是必须统一译名,再次是要重视翻译人才的培养。他对我国佛经的翻译也非常重视,进行过深入的探索和研究,有许多新的发现。

严复曾留学英国,回国后担任过京师大学堂附设的译书局总办及北京大学校长,有着非凡的人生及见识^[2]。严复对中国翻译事业上的第一大贡献就是将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学》翻译过来,名为《天演论》。他的《天演论》是有选择、有取舍、有改造地翻译而非忠实的译本。他对外国思想的介绍力求服务于当时中国的需要而非生搬硬套。《天演论》以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科学性和说服力,激起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使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为后来的救亡运动做了一次社会总动员,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严复对中国翻译事业的另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信、达、雅”三字翻译标准。他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明确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易》曰:

‘修辞立诚。’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以后近百年的翻译史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的译者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用这一标准来衡量自己的翻译，无一不受到这一标准的制约。

林纾不懂外文，然而他却传奇的走上了翻译的道路，成为了译坛泰斗^[3]。其译作数量惊人，硕果累累，如《迦茵小传》《孝女耐儿传》（现译《老古玩店》）《块肉余生述》（现译《大卫·科波菲尔》）《贼史》（现译《雾都孤儿》）等。他以酣畅优美的译笔开创了我国翻译事业繁荣的局面，在他的带动下，翻译队伍日益壮大，促进了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当时国人读了林纾的翻译小说，了解了西方社会的风土人情以及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因此，林译小说风靡一时。林纾与别人合作译书，《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读者将此书誉为外国的《红楼梦》。它以发展真性情的思想启发了人们想到婚姻自由，从而觉悟到必须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反封建。《茶花女》给沉闷的封建制中国带来了新的观念，激发了世人变革的热情。《黑奴吁天录》（现译《汤姆叔叔的小屋》）是林纾的另一大译著。此书对美国反对奴隶制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被林纾翻译后对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起到了作用。林纾不仅把我国的翻译事业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也促进了中西比较文学的发展。林纾翻译的小说让国人看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激发了读者的爱国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小说当时在中国的地位。

清末民初的科学翻译形成了我国翻译史上的“高潮”，给国人带来了新的观念，促进了我国各科学门类的发展，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等领域产生了影响。这一时期对外国小说、诗歌和戏剧的翻译活动开始活跃起来。通过一些翻译活动，中国文化也在域外得到了传播。

2 民国时期的翻译活动

民国时期我国的翻译活动空前繁荣。“五四”时期是我国近代翻译史上的分水岭。“五四”以前，通过梁启超和严复等翻译家的艰苦努力，介绍先进的西方思想、价值观念和社会生活，使中国人民意识到了自己的落后。中国的旧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觉醒，同时新的知识分子被孕育出来。“五四”以后，鲁迅等一批具有先进思想观念的知识分子开始翻译西方书籍，瞿秋白等革命前辈开始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西方各国尤其是俄国和苏联的优秀文学作品开始介绍到中国。这一时期的翻译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很大变化，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我国翻译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鲁迅创作与翻译并重，是我国民国时期的大文学家、大翻译家^[4]。他翻译过许多俄罗斯及苏联的著作，其中

最著名的是法捷耶夫的《毁灭》果戈里的《死魂灵》。鲁迅在翻译《死魂灵》时耗费了巨大的心力，但在翻译过程中对归化和异化形成了独特的看法，此后的翻译家称赞他这部译作为“直译”的典范。鲁迅在翻译时以严格的标准约束自己，带着高度的责任感，一丝不苟的处理译文。他总是竭尽全力了解清楚了原文的意思才动笔翻译，从不胡乱发挥。这种严肃认真、精益求精的翻译态度为当时的广大译者树立了榜样，狠狠打击了胡译、乱译等盛行之风。他对翻译标准的观点是：“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易解，一则保持着原文的风姿。”他针对有人所谓“与其顺而不信”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这一原则，虽有“矫枉必须过正”的意味，但并不是“死译”。他主张直译，一是为了使译文容易理解，二是为了保存原作的风姿。鲁迅提出的“硬译”理论，为翻译评论家评论译作提供了新的标准。

郭沫若以优美的译笔享誉海内外，对中国翻译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5]。他的重要译著有：《沫若译诗集》、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上、下卷，俄国屠格涅夫的《新时代》、英国的《雪莱诗选》等等。郭沫若把翻译视为向国人传播知识的途径，把世界一流的文学作品推荐给中国读者。与鲁迅一样，他提倡严谨的翻译作风，坚决反对“胡译”和“滥译”。郭沫若严肃认真的对待翻译事业，认为译者在动笔之前，必须把握原文作者的情感，认为译文和原文必须在意思上一致，但形式上不必拘泥小节。郭沫若强调译者的责任心，在翻译之前必须慎重选择材料，翻译过程中遵循“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他还说道“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广泛地参考，多方面赐教，尽量的琢磨。”

民国时期中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中以俄苏文学的规模最大^[6]。“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开始大量翻译俄苏文学作品。中国文化也一直吸引着俄罗斯，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对中国及汉学研究十分重视。俄苏的汉学家全面研究和翻译中国的诗作，包括古代诗歌，如诗经、楚辞、汉赋和乐府，以及唐诗和“五四”运动之后的现代诗歌。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文学界提倡新思想、新文化。由于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崛起，其文学艺术也空前繁荣。中国学者、文学家肯定当时日本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中国的翻译家也对日本文学持肯定态度，大量翻译了日本的文学作品^[7]。

“五四”时期，英国文学翻译队伍也日益庞大，涌现出一大批如卞之琳、杨宪益、张谷若等的杰出翻译家。这一时期翻译的英国文学作品有诗歌、戏剧、小说等，涉及的作家主要有莎士比亚、雪莱、笛福、拜伦、萧伯纳、狄更斯、哈代、勃朗特姐妹等，他们分属古典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唯美主义、象征派、意识流文学等流派^[8]。

3 建国后的翻译活动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翻

译事业也蓬勃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翻译队伍不断壮大,他们不仅能译出高质量的作品,而且总结出了全面系统的翻译理论。但盲目地追求洋理论,忽略我国翻译理论的优点,只会导致翻译活动的混乱。因此,罗新璋、刘宓庆和黄龙等人提出了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翻译理论体系的设想^[9]。20世纪末,我国相继出版了黄龙的《翻译学》、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刘宓庆的《当代翻译理论》、陈福康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等大部头成系统的翻译理论著作。

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的这一次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范围、质量水平还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我国的翻译工作者所翻译的领域已不是文学艺术的“一枝独秀”,而是军事、外交、科技、社科、法律、贸易、文教、卫生等领域的“百花齐放”。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由于全球信息时代的来临,交流知识和信息都离不开翻译。此外,这次翻译高潮的出现又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强国之路的结果。中国要在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等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就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与其他国家在学术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而这些合作与交流都都离不开翻译。对翻译标准认识的日趋统一大力推动了我国的翻译工作,特别是在过去的20年中,我国的翻译队伍积极响

应党的号召,通过严谨认真的翻译活动,与西方国家介绍和交流先进科技知识、优秀文艺作品以及民族文化,为我国四个现代化和世界和平不断做出新的贡献^[10]。

参考文献:

- [1] 孟祥才. 梁启超传[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 [2] 皮后锋. 严复大传[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 [3] 张俊才. 林纾评传[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 [4] 刘绪源. 解读周作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 [5] 秦川. 文化巨人郭沫若[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
- [6] 李明滨. 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 [7] 王向远. 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8] 王宏志.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 [9] 罗新璋. 翻译论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10] 张柏然. 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责任校对 王小飞)